

新闻春秋 (第九辑)

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黄 珂 / 副主编 李 春 陈建云 白红义

目 录



· 一、报人研究 ·

章太炎的报人品格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系	曾宪明	/	003
李大钊与《晨报》	上海建桥学院文化传播系	钱晓文	/	012
孙伏园和武汉《中央副刊》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都海虹	/	017
功在国家 业在社会				
——《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之批评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史量才研究会	庞荣棣	/	024
解析邹韬奋的受众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乔云霞	/	032
以人为本也是新闻媒介之道				
——以邹韬奋办报刊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谢金文	/	040
抗日要表现在行动和事实上				
——邹韬奋《生活日报》社论观探析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刘宝珍	/	044
家事、国事、天下事 启蒙、救亡、现代性				
——浅析邹韬奋国外通讯思想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马彩红	/	052
重读邹韬奋的大众新闻思想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关淼、马艺	/	062
民族·战争·性别视野中的田村俊子研究				
——以田村俊子 1942—1945 上海《女声》时代为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涂晓华	/	070

CONTENTS



作家报人周立波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普丽华 / 080

· 二、报刊研究 ·

北京白话报与阅报社 北京世纪阅报馆 李润波 / 091

《京报》春秋

——从报房《京报》到《京报》再到《新京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 郑保国 / 100

上海英商在汉口所办《字林汉报》及《汉报》分析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阳美燕 / 106

论维新报刊的局限性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 刘兴豪 / 123

同盟会内部矛盾对《民报》停刊的影响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亮 / 130

北洋政府时期京津地区英文报的对日舆论斗争评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冯悦 / 138

人的“现代化”论《良友画报》的都市女性叙述 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刘永昶 / 149

罗隆基主撰时期(1932—1936):《益世报》社评的舆论调控观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马艺、张培 / 157

目 录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阴雨永、王晓红 / 165

试论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的抗日战争宣传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臻 / 172

论陕北民间传播习俗与《边区群众报》的大众化实践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杨立川 / 186

简论孤岛时期坚定抗日的《文汇报》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刘莹 / 192

华北日伪治下的《实报》研究

——以报道倾向及特点为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杰琼 / 198

左翼刊物《客观》及相关人物的事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李春 / 209

历史虽久远 生命仍鲜活

——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金沙周刊》历史文化自觉植入现象探析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董秦 / 220

民国时期闽南地区的华侨报纸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赵振祥、毛章清 / 226

民国时期徽州报刊发展概览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蒋含平 / 238

· 三、新闻通讯、广播电视业研究 ·

在中央苏区创建的红中社

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所 郑德金 / 249

CONTENTS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发展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万京华	/ 261
温济泽早期的广播思想	山西大学文学院 贾临清	/ 272
中国少儿电视节目史简述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谈媛	/ 278
我国直辖市广播电视志编撰特点研究 ——以北京、上海、天津的广播电视志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哈艳秋、王美	/ 288
以“电视大学”为例看广播电视史研究中“史志互正”方法的应用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 刘书峰	/ 301
浅论广播电视志与广播电视史编纂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何筠	/ 307
试论新时期如何加强广电志书的服务性 ——对广播电视志编纂创新的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李文竹	/ 315

· 四、多重视野下的新闻史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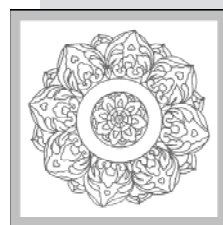
论电报的运用对中国式新闻叙事与新闻专业化的影响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陈昌凤	/ 323
20 世纪 30 年代《申报》的国际新闻	东京经济大学博士研究生 赵日迪	/ 330
近代上海体育新闻传播发展略论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 薛文婷	/ 342

目 录



新闻媒体与“黄逸峰事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陈建云	/	351
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史	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	王大龙	/	359
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研究探微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白润生	/	367
研究上海新闻史的回顾与体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马光仁	/	374
地方新闻史研究体例创新刍议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邵宝辉	/	382
“中国新闻史学史”学科建构初论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蒋海升	/	389
如何正确对待新闻史经典著作				
——以中国大陆发行的《中国报学史》几个版本的变化为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扬	/	397
如何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李谢莉	/	416
编后记			/	423

一、报人研究



章太炎的报人品格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系 曾宪明

〔内容摘要〕 章太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问家,其一生很多时间都是与报纸相伴的。从章太炎清末报刊活动不难看出,他走过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心路历程,从早期的拥护改良,到向革命思想的过渡,再到成为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的性格人品异于常人,他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疾恶如仇,胸怀坦荡,治学从不随波逐流,多有独立见解,这些性格特点同样体现在其报刊宣传上。

章太炎的独特品格所形成的独特言论风格,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宣传立过汗马功劳,被称作“以文章排满的骁将”,但与此同时,他的某些性格局限,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报刊宣传效力。

〔关键词〕 章太炎 报刊 品格 宣传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几位以报刊为阵地进行反清排满的报人值得关注,章太炎是其中一位最具特点的人物。章太炎与于右任不同,后者主要是以自办革命报刊且办得很好而闻名清末报坛,而章太炎却很少自己办报,其主要是以在报刊上撰写反清文章而著名。章太炎独特的人格和品质,同样反映在他的报纸宣传工作中,更多的时候,其独特的报风是指向敌手心脏的利剑,但在一些具体业务作法上,有时也体现了他性格和报风的局限性。

一、从章太炎清末报刊活动看其心路历程

同当时许多爱国人士一样,章太炎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从拥护改良到宣传革命的过程。



1. 拥护改良

章太炎与报纸的接触从《时务报》始。1897年，他受汪康年、夏曾佑的邀请到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工作。《时务报》是维新派前期最重要的机关报，章太炎很快在报纸上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文章，开始了宣传维新变法之路。

章太炎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但却反对康有为“创立孔教”。1897年4月14日，章太炎借酒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闻讯，率数人当众把他打了一顿，章太炎愤而离开报馆去了杭州。在杭州，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经世报》和《实学报》，发表了《变法箴言》等文章，坚持宣传变法维新，但因与报馆中反对变法的王仁俊等人分歧日重，又离开杭州，于1898年3月底来到武昌。当时的张之洞正在武汉筹办《正学报》，命令顽固派人物、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梁鼎芬只知章太炎与康有为有隙，不甚了解章太炎是真心拥护康梁变法，想假章太炎之手为《正学报》起草两份反对康有为变法的宣言《正学报缘起》和《正学报例言》。不想章太炎将自己草拟的六万字呈送梁鼎芬时，令梁大感意外——满纸的改良变法。梁鼎芬极为恼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几百数十次。后来章太炎又反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鼎芬接受了王仁俊对章太炎“以疯子逐出”的建议，将其逐出报馆，章太炎被冠以“章疯子”的绰号大概起于此。（据说梁鼎芬让轿夫先用抬轿棍把章太炎痛打一顿，然后抬出送走。后来凡章太炎与人争执，朋友即开玩笑说“叫梁鼎芬来”。）

2. 从改良向革命过渡

章太炎武昌主笔《正学报》被逐后，于1898年7月来到上海，很快被聘为《昌言报》主笔。开初，他除了翻译了几篇文章之外，没有自著文章继续宣传改良变法。对章太炎震动很大的是改良派的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使章太炎有所醒悟。他在《昌言报》第七册上发表了总结汉、唐变法失败的《书汉以来革政之狱》一文，对“革政”变法的做法进行了反思，维新思想有所动摇。这个时间，章太炎对维新变法做法仅只是处于怀疑阶段，一方面，他怀疑改良是否是救国之良策，另一方面，他还不了解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自己又没有很好的办法，于是便带着些许怀疑，仍然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人藕断丝连，对康梁之变法抱有一定的希望。百日维新失败后，清廷搜捕支持变法的各报馆主笔，章太炎被迫外逃避难。1898年12月4日，他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台湾，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后藤新平，当上了《台湾日日新报》的特约撰述。这时他仍然写信与康有为互通，殷殷叮嘱康有为多多保重，表示继续扶持他的改良事业。康有为每每接到章太炎的来信，即感动得热泪横流。

章太炎这种怀疑、暧昧状态不久就发生了改变,随着他对保皇派怀疑的日益加深,用革命方法救国的思想越来越浓烈。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与下列因素有关:第一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了解。1900年前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之革命派在香港创办了其第一张机关报《中国日报》,对章太炎影响很大。于是他首次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不但抨击慈禧,而且将矛头指向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疆论》一文。第二是他已经不能理解康梁的言论和行为。改良派百日维新的鲜血还历历在目,但他看到的却是康梁在海外仍在大肆宣扬“尊皇攘后”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第三是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和了解。章太炎与孙中山的交往可分为“三步曲”:知孙,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使他第一次知道了革命派和孙中山的名字;见孙,1899年6月,他经梁启超介绍,在日本神户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对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识孙,1900年以后,他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有了质的认识,使他彻底抛弃了改良思想,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于1900年8月3日毅然剪掉了代表封建皇权的发辫以明志,并在《中国旬报》上发表了《解发辨说》。从此他短发西装,大摇大摆昭示于众。同年8月8日,他将《解发辨说》寄给在日本的孙中山,并随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和坚定的加入革命队伍的信念,章太炎终于完成了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过渡。

3. 以文章排满的骁将

章太炎以剪发辨明志之后,以文章排满的行为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最早明确反满的书是1900年出版的《馗书》(其论文集),该书四个部分内容之一便是“以反满反帝为中心的民族论”。他的最早的向资产阶级改良派叫板的政论文章,是1901年8月10日发表在《国民报》上的《正仇满论》。此前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封建专制却反对革命的《积弱溯源论》,章太炎利用他在东吴大学的工作之余写出了《正仇满论》,指名道姓地批驳梁启超的观点。此后,他利用讲台和书报大力鼓吹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多次受到清政府的迫害。

在章太炎所受的迫害中,以“《苏报》案”最为轰动。《苏报》创于1896年的上海,原是一张格调不高的民营报纸,四年以后卖给了在江西被免官后搬来上海的陈范,到1903年逐步转变为宣传革命的报纸。章太炎1902年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该学社与当时逐渐倾向革命的《苏报》发生了联系,章太炎等人便经常利用《苏报》作为革命宣传的阵地。1903年5月底,邹容的反清小册子《革命军》出版,6月9、10两日,《苏报》连续发表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等三篇介绍和评价《革命军》的文章,清廷已大为恼火。6月29日,《苏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章太炎撰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该文不但



直呼光绪其名,而且骂他为“载活小丑,未辨菽麦”,终于引发了“《苏报》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拘捕了章太炎和第二天投案的邹容,以“行为犯上”为名分别判处两人三年和二年徒刑。章太炎和邹容在审判过程中大义凛然,据理反驳,常常问得审判人员张口结舌。章、邹两人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时称“西牢”)后,继续饱受“软梏”之类的酷刑的折磨,并且“每餐粥一盂,豆三粒,夜仅一毡,日做苦工”。二人互相鼓励,斗争很坚决,章太炎还曾以绝食的方式抗议狱方的迫害。“《苏报》案”在全国甚至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广《革命军》的最佳广告。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立即于当晚乘船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在报刊宣传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立即接替了时任《民报》主编的胡汉民的工作,开始主编这张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同盟会最重要的报纸。在《民报》的先后几任主编(胡汉民、张继、汪精卫)中,章太炎是主编时间最长的(26期中的14期),作出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另一件是领导了报刊思想宣传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论战。这次所发生的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首的革命与保皇的论战,牵涉双方20余家报刊,历时一年有余,最终以保皇派的失败而告终,其领头报纸《新民丛报》也在梁启超的“凄然泪眼”之下悄然停刊,从此确立了革命派报刊的舆论主导地位,而保皇派报刊则从此走入低谷和末路。章太炎作为《民报》的主编,自然是这场论战的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

章太炎的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他的那股革命锐气渐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太炎先生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二、章太炎性格与其宣传风格

章太炎是什么样的人品和性格?这要从他少小的时候谈起。章太炎出身诗书世家,国学功底良好和勤奋好学自不必说,单就他9岁随祖父学习、13岁随父亲学习期间的表现,起码可以总结三个特点:一是不像一般私塾童子那样只知读死书,而是善于思考,常喜向大人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问得长辈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二是特别喜欢古文辞,最不喜欢八股文,并对其深恶痛绝。三是不像一般人那样读书是为了仕进,少小厌恶走仕途,所以16岁那年父亲让他到县里应童子试,自己假装患了“眩厥”之症,不去应试,并从此意绝八股,不问科举,断了仕途之路。章太炎做事异于常人、言论风趣尖刻的性格特点,是从其少小时就显露出来的。

从杭州诂经精舍走出来的章太炎已是满腹经纶的成年人,成年后的章太炎的性格和人品如何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1. 独行孤见,异于常人

上边提到的章太炎少小性格倔强,读书时就不同于常人。其实他22岁进入杭州西湖的古老书院——诂经精舍时,这种独行孤见和异于常人的品格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一代名儒俞樾的弟子,他参与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战,竟然写出了50万字批驳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逢禄,表现出了他敢于向名人挑战的气概。走出学堂大门之后,章太炎的这种性格不但表现在言论文章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比如光绪年间,俄法入侵,爱国人士聚会演讲,一般的演讲人都是依次循规蹈矩地顺着台阶上台,唯有他“不自后循阶拾级而上,由前台攀援而升”。别人登台尽侃侃而谈,唯有他“演说不数语”,喊几句“不可不革命”就下去了。再比如一般人家给孩子取名都是为了好听、好记、好读和吉利,章太炎纳妾王氏有三女,他分别给三个孩子取名“章玆”、“章燹”和“章圭”,既不好读,也不好认。据章太炎的学生刘文典(刘文典原来是刘师培的弟子,而刘师培和章太炎有过节)回忆:宣统三年,刘文典拜章太炎为师时,章太炎问刘文典从过何师,刘不得已地回答说:“从刘先生读过《说文》和《文选》。”刘按常理推断章太炎会很不高兴,不想章太炎闻听后反而大喜,和刘文典谈了几个钟头,并收其为弟子。无数事例可以证明,章太炎思想独特、言论标新、行为怪异,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在“《苏报》案”发生后能逃而为什么不逃了(当时的上海《新闻报》载文说,案发当晚有人告诉章太炎快逃,而章认为“小事扰扰”,依旧钻进被窝呼呼大睡,真是太愚了。后来章太炎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答新闻报》,表明自己“志在流血”,从而“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类”,不是不能为,是故意而不为)。

章太炎的这种性格同样表现在他的治学和报刊政论方面,其特点是言论无所顾忌,立说好异前人,著文时有新见,不盲从,肯思索和有主见。这种性格也成就了他在风云激荡的年月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反叛思想。

2. 狂放不羁,不拘小节

章太炎被时人起了不少绰号,如“章疯子”、“狂生”、“异端”、“神经病”等。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很多小时读过的书都能过目不忘,直到成年后都能准确地背诵出来,应该说是记性极好的,但小的时候却“出门不知所归”,连回家的路都记不住。他还是个绝对敏锐的人,不但表现在成年后的对敌斗争中,而且小的时候应变能力就很强,但吃饭时无论有多少个菜,他只吃眼前的几个菜,又显得十分呆板。



章太炎的狂放和不拘小节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服饰和言行上。1900年断发之后,不但仍着旧装,而且“夏裸上身,裤带以两缚腿带接之,不紧,常提裤”。那时的旧式布袜的底面是不同的,一天,家人发现他的脚背隆起来了,原来他把袜子穿反了。就是穿皮鞋,也常常左右穿错而毫不在意。所以有人回忆说章太炎“行动奇诡,翦发分梳,垂于额际,恒著长袍,外裹以和报,不衫不履,不中不西。人见之,匿笑,而太炎自若”。关于自己的“狂”和“疯”,连章太炎自己也承认。1906年他因“《苏报》案”刑满出狱,在日本留学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就说:“人谓我有神经病,我是疯癫,我不以为异而反觉欣幸。……大凡非常可怪之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敢说。遇艰难困苦时,不是神经病,断不能百折不回。……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事业者,必有神经病。”章太炎是把他的这种性格作为在当时社会与敌斗争和做大学问的手段来对待的。

章太炎的大事不糊涂、小节不拘泥的性格造就了他报刊政论独特的风格。他的政论不但逻辑严密,气势雄伟,文辞娴雅,陈古证今,而且风趣尖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是因为“狂放”,他才敢于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中直呼皇帝其名,骂光绪为“载湫小丑”;正是因为不拘泥,他才在与吴稚晖的论战中称吴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章太炎思维敏捷,说话同样风趣尖刻。“《苏报》案”开庭时,法官问他为什么称皇上为“小丑”,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小丑”可作“小孩子”解,我称皇上是小孩子不算什么侮辱。章太炎第二次去日本时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会”,被日本警方传讯,警长问他是清国何省人,章迅即答道:“余等为支那人,非清国人。”“《苏报》案”中审判员问他“得自何科”(指什么科举名分),章太炎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便故作糊涂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冀之有?”章太炎的这种性格用在对敌斗争中,常使敌手狼狈不堪,而自己大获全胜。

3. 疾恶如仇,胸怀坦荡

这是章太炎至老未变的重要品格和性格,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上述谈到的他办报的各个时期,都有这种性格的表现——只要认定一个方向,就决不妥协:只要认为是对的,他不怕坐牢杀头;只要认为是错的,就是亲朋好友也不客气。早年他追随康梁倡导改良,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发现康有为大立孔教,就毅然分手。后来他追随孙中山,为同盟会主编《民报》,却因为孙中山对《民报》支持不够而与孙翻脸,要出家当和尚。梁启超是他的老朋友,曾多方面帮助过他,但后因政见不同,章率《民报》猛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把老朋友搞得老泪纵横,报纸也停刊了。吴稚晖曾是他的亲密战友,但因怀疑吴在“《苏报》案”中出卖革命同志,章出狱后曾利用报刊与吴进行过长期论战。章太炎的“胸怀坦荡”突出地表现在他不以一时一事否定别人一生一世方面,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功过

分明。他不因刘文典曾是他的仇人刘师培的弟子而拒绝刘文典(前边谈过);他也不因与孙中山翻脸,并且在晚年多次攻击孙中山而全盘否定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去世,章太炎撰长文祭悼,情甚悲切。

章太炎的这种性格至老未变。民国二年,章太炎被袁世凯拘禁在北京龙泉寺,他就在一切几案之侧、门窗之边遍书“袁世凯”三字,每天用拐杖击打,身陷囹圄而疾恶不变。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时,他的旧友孙岳因路过上海到章太炎家中求见。孙岳先是民党的人,后又附曹锟,章太炎很看不起他。于是章持杖到楼门口,大骂他“乃北洋派鹰犬”,孙狼狈而逃,章仍追骂不休。所以有人评价章太炎是“严气正性,疾恶尤甚”,应该是有道理的。

三、章太炎性格和报刊宣传方面的几点局限

章太炎无疑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伟人,被鲁迅先生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无疑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极具性格的人物,并且到1912年任《大共和日报》社长止的16年时间里,共创办和参与过不少于十种报刊的工作。其间他写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都是极具性格和特点的,曾经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在肯定章太炎的同时,我们也不难从专业实务的角度发现他的某些局限性。

首先是章太炎漠视宣传效果。任何传播的终极目的都是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章太炎著书撰文不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文必法古,喜用古字、奇字和生造字,且文法古奥,深奥难懂,不但一般百姓读不懂,连一些学问家都费解。这就影响了很好道理的传播。他给他的三个女儿所取的名字之生僻生造自不必说,即使是他很有名的著作《诂书》的“诂”字,就很少有人读得出来和明白字义,加之内容文字艰涩,该书销量很小,卖不出去。他早年在《时务报》写《论亚洲》和《论学会》两文时,因文章气势雄伟,梁启超赞为“真巨子也”,但用典多且生词古奥,所以黄遵宪写信给该报经理汪康年:“此文集文也,非报馆文也。《时务报》的读者也写信给他提意见:‘太艰涩,洗太散碎,观者颇不悦目。’百日维新后,康梁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一张《清议报》,章太炎此时已对保皇派产生怀疑,于是想写一篇主张光绪“引咎降名”的《客帝论》发表在该报上。这首先要蒙骗过具有保皇思想的该报主编梁启超,因而文章用词古奥,艰涩难懂,梁启超被骗过了,文章也发表了,但连梁启超都没看明白的文章又有什么传播效果呢?后来他在《台湾日日新报》工作,报馆主笔觉得他的文章不易读,曾问他:“先生,您所撰论说,是要自解自读的,还是要给一般人共读而俱解的呢?”章太炎听不进这些意见,反而以“文必法古”而自矜,他的回答是:“世人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



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可见章太炎是故意漠视受众和传播效果了。其实章太炎不是不会写大众能读得懂的文章，如《驳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就是一篇气势磅礴又通俗易懂的文章。他在狱中与邹容唱和的小诗《狱中赠邹容》也一改其写诗喜用典故的癖好，写得充满感情、平白如话。这些都说明章太炎不是“不能为”，而是“不为”也。

其次，缺乏一定的社会生活常识。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既了解世界大势，又了解中国的民情民生，书又读得好的；一类是书读得很好，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了解也不求了解，略显迂腐的；再一类是读死书、死读书，除了书本知识，对社会漠不关心的“腐儒”；最后一类是书既没读好，政治上也模糊迟钝一事无成的。章太炎当然不属于后两类，也很难归于第一类，可以归属第二类。章太炎的书读得好，是人所共知的。从他思想转变和言行看，他大事不糊涂，但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就显薄弱了。举三个例子：一是他不知道怎么用钱。让别人给自己买一包烟，他给5元钱；女儿要一件大衣，他给了5元钱；他要在苏州建一栋房子，他也给了5元钱，仅知道钞票一次要花一张。二是有时读书到了痴呆的程度。章太炎少小时就喜好读书，成年后读书著文成为其唯一爱好。晚年时自居一大室，四壁皆书，连窗下都是书。室中置一床，常常半夜醒来想起一个问题就光着身子起来翻书，至达旦。天亮时仆役到其卧室，见他呆若木鸡，告诉他：“老爷，你还未着衣服呢！”这书就读得有些太痴迷了。三是不会理日常交往之事。章太炎晚年居苏州，有一次要买房子，别人领他到房主家。一进门看见楼房，自言道“还有楼”；看见有树，又自言“还有树”，不再多看即行论价。房主要15 000元（已很贵），他说，给17 000元吧！等夫人赶到已经晚了。结果这房不能住，租又租不出，卖又无人要，很麻烦。上述材料都是些生活小事，依章太炎的性格推断，这些行为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章太炎的读书研究精神很可贵，但无论是作为一名政论家或革命者，如果不了解社会，就是不全面的。

此外，章太炎倔强和好斗的性格也存在一些负面效果。比如他曾经在很多报馆工作，究其离开报馆的形式，几乎全是与主人闹翻而离去的。在《时务报》与康有为，在《经世报》与王仁俊，在《正学报》与梁鼎芬，在《台湾日日新报》与善兵卫，乃至在《民报》与孙中山，均翻脸而去。如果因政见原因脱离报馆尚能够说得过去，但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翻脸却不是因为重大问题。有些问题可以解决而不善于解决，就是一种局限。再比如，如何处理自己的狂放、自豪与狂妄、狂傲的关系上，章太炎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其狂傲的成分。他在《台湾日日新报》任中文版撰述时，有一天和记者李书闲谈。章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答20岁才延师启蒙。章太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了，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20岁已经读罢了。李书惊讶地问：“你读的书都能记得吗？”章太炎答：“不太记得，但是百分之九十五还可以背诵。”李书就以自己所记的经书考他，章太炎不假思索，如数家珍，甚至连哪一句在何书何页

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这里“20岁已经读罢了”是有些夸张(他22岁才入诂经精舍,28岁离开书馆),但其中饱含的自豪感,是溢于言表的。但是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章太炎在其书信中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还有一次有人问:“先生认为胡适怎样?”章太炎厉色道:“胡适配谈哲学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连根都没有。”这就有些言过其辞了。章太炎一生所佩服的人中,除了他的老师俞樾外,其他人确实很少。

章太炎的为人品格和言论风格有很多独特和可爱的方面,他学识渊博,思想恢阔,见解深刻,虽然不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毕竟瑕不掩瑜,不失为一名“有学问的革命家”。

李大钊与《晨报》

上海建桥学院文化传播系 钱晓文

〔内容摘要〕 研究系创办的北京《晨报》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为宗旨,但在“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开风气之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并非《晨报》政治立场转变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李大钊对《晨报》的支持和帮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李大钊已从倾向改良思想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利用研究系的报纸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中国报刊宣传史上的一个亮点。本文通过翔实材料,从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与研究系的关系等角度来分析探讨李大钊对《晨报》的积极作用及其特殊性。

〔关键词〕 李大钊 《晨报》 马克思主义宣传

“五四”时期以宣传改良主义为宗旨的北京《晨报》之所以能够宣传革命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当时已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一群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参加了《晨报》建设,特别是李大钊对《晨报》的支持和帮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里主要从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与研究系的关系等角度来分析探讨李大钊对《晨报》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李大钊经历了由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年接受西方立宪政治和民主主义的影响,受改良主义影响较大。还在天津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时就受到来自君主立宪派思想的影响。1913年5月梁启超和汤化龙等人合作组成进步党,李大钊也参加了这个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由此进入了政治生活,并积极发表政论文章。这时的李大钊由于并不想依附军阀找官做,因而能对当时的昏乱的政治作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与当时的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他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能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的政治主张,他在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不恰